

父亲离开我们竟然有15年了。

父亲出生在河北省灵寿县，14岁追随南下的舅舅来到安庆东流县，成为县委会的通讯员。可当时的父亲一个字也不认识，急性格的他急得晚上睡不着。他发现县委食堂的厨师长识字，就拜他为师，每天请教10个字。持续了一段时间，厨师长的文化终究是有限的，于是他让父亲买本字典做老师。就是这本小小的字典让父亲的世界有了一束光，照亮了他的自学之路。这本50年代翻旧了的字典，后来被我带到北京，每每看到它，就会看到少年时期的父亲在昏暗的灯光下夜以继日学习的场景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父亲不仅能看书读报写信，还能写诗写文章并创作了多部剧本，对文学的热爱仿佛与生俱来。父亲在音乐方面的天赋也是超乎常人，各种乐器他摸几下就能演奏，尤其是二胡，能给人伴奏黄梅戏和京剧，自己还经常自拉自唱。

后因工作需要，父亲被调到安庆地区机要局。那时的他比较神秘，经常带有一把左轮手枪，绝对不让我碰。他总有出不完的差，忙不完的工作。我长大后才知道，父亲当时长期送机密文件，穿梭于周边各县，交通十分不便，一旦碰到紧急任务，总是骑车或步行前往。有次去岳西，父亲在崎岖的山路上走了一夜，终于安全准时将文件送达。母亲说，那天

天上的父亲

父亲生于1939年，八岁时就在我大姑的村子给地主家放牛，十八岁那年开始在我们村的后山挖煤。以前的煤矿都靠人工开采、矿底潮湿、阴暗，他也由此终身落下关节酸痛的毛病。

父亲挖煤时，爷爷早已去世，大姑和二姑也已出嫁，大伯和二伯常年在外，全家生活的重担就落父亲一个人身上。父亲是个孝子，他就是靠这一点卖苦力的钱，养活奶奶和小姑(也是他最疼爱的小妹妹)，自己却经常饿着肚子。

我姊妹众多，有五个姐姐，还有两个早夭的哥哥，我时常想，假如有一个哥哥活下来，可能就没有今天的我。父亲没有念过书，因而特别懂得没文化的辛酸，他对子女的教育非常重视，尤其对我，特别严厉。上学时，我特别羡慕同村其他孩子，他们一放学就能在一起做游戏，而我只能回家看书、写字，以致村子里的大人小孩都以为我古怪、不合群。念小学时，我家离学校大概有三四里路，有一年冬天早晨，外面下大雪，路上积雪大概有一尺多厚，父亲拿着铁锹在我前面一步一弯腰，硬是铲出了一条路，蜿蜒到达学校。这条路延伸到我的人生中，让我在遇到困难时不退缩，让我时时刻刻记得父亲的殷切期望。

正是因为有父亲这样的严厉和期待，我才能成为村子里第一个跳出“农门”吃上“皇粮”的人。

我家那时有好几亩芦苇荡，芦

父亲回家，满脚大泡。

最让我敬佩父亲的是他的处事和工作态度。有段时间，很多单位都不上班，串联、游行、打砸抢，比比皆是。父亲说，社会再乱，邮政通讯不能乱。他自作主张，在安庆遣送站开设义务服务窗口，收纳居民信件，晚上将邮票、资金带回家保管。安庆火车站的很多司机都和他成了朋友，他每天驮着几麻袋信件，将一般信件托司机带到各地邮局中转，对重要的文件他就随车一起送。后来社会秩序恢复正常，他将账目和资金上缴，竟然是分毫不差。

父亲还利用周末去田间地头帮农民干活，家里人都不知道这事。有次父母一起外出，遇到一位卖菜妇女，热情地叫着父亲“方同志”。妈妈笑着说他不姓方，姓李。只见父亲一个劲地给妈妈使

父亲并没离开

李宜华



作者家人合影，左二为作者父亲李清山

眼色，但那位妇女滔滔不绝地告诉母亲，方同志每个星期都到他们大队干农活，母亲这才知道父亲是化名去学雷锋了。

父亲做过的好事不胜枚举，我们也多是从别人的口中知道的。1967年，父亲是被评为全国劳模，可是他死活要将荣誉让给县里的一位同志，说他在县里更辛

苦。他后来是作为安徽省劳模和学习积极分子代表，去北京参加全国代表大会，坐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排，见到了周恩来总理。回到安庆，大街上拉起了巨大的红色横幅，欢迎他从北京归来。这也是父亲一辈子的骄傲。

进入20世纪80年代，父亲越来越厌倦机关的一份报纸一杯茶的状态，要求调到外贸系统，后又被派到分公司负责人事和政工工作。工作的内容变得比较复杂，请客送礼溜须拍马的现象越来越常见，父亲特别看不惯。有人给家里送来6个苹果和2斤麻油，外婆让我吃了一个，父亲回家后非常生气，立刻去商店买来一个补上送了回去。后来每每再有人送礼，他总是黑着脸让人家拿走，大有一种不近人情感觉。

1998年父亲退休，同母亲移居北京，这是我们阔别多年又重新在一起生活。父亲柔软了许多，特别是看我儿子的目光，眼中闪烁的慈爱的光芒，是我小时候不曾见过的。退休后的父亲更忙了，历时3年写出了40多万字的自传。这份手稿一直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柜里，是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精神财富。

死亡并不是离开，而遗忘才是，父亲并没有离开，他一直活在我的心里。

李宜华，安庆籍，定居北京，法学学士，金融研究生学历，从事金融工作20多年，爱好写作、厨艺、种菜。

父亲原是放牛娃

翟斌



作者家人照，中排右二为作者父亲翟宗普

苇可以卖给盖房子的人家，每年有一笔不菲的收入，姐姐们闲暇之余加工渔网，也能挣一些钱，家里的经济条件还算说得过去。经常有亲戚朋友来家里借钱，父亲总是想方设法弄些钱，递到他们的手上，此外，还会买来酒菜，好好招待人家一番。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：“打酒醉朋友。”意思是，客人来了，家里再穷，也要买酒买菜，让朋友吃好喝好。这种骨子里的好客和侠义，至今也影响着我。

父亲没念过什么书，虽然通过自学也认识不少字，但他知道自己文化少，难堪“大任”，当了几年村书记，就主动请辞。乡里念他为村里做了不少贡献，准备叫我初中刚

生活，母亲帮忙买菜做饭，父亲帮我们带孩子。他那时对我严厉，但对我的儿子完全不一样，宠爱有加，恨不能将世界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。我和妻子平时都上班，很少有时间带，儿子从出生到上小学四年级之前，基本上都是父亲带着的。我有时看到他领着儿子出门、进门的那副表情，既开心，也感动——他是多么爱他的孙子啊！那几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吧？

但幸福并没有延续太久。几年前，父亲感到不适，去医院检查，食道癌，手术一年后癌细胞发生转移。弥留之际，母亲征询他身后是回老家还是留在安庆，他说：“在安庆不是要花很多钱吗？”他说的花钱，是指买公墓。但我知道，他内心深处是想留在安庆，这样也方便我们以后祭奠。母亲说了一句：“这是他们应该花的。”父亲沉默不语，但他心里一定是欣慰的。

2013年11月19日，时值初冬，小雪刚过，天气寒冷。那天凌晨，父亲躺在我的怀里，我拥着他，握着他的手，他慢慢地闭上眼睛……

上个月，大姑去世了，年近百岁。大姑落葬在父亲当年放牛的地方。那天，雨特别大，我站在大姑的坟前，眺望大雨之下连绵起伏的远山，仿佛看到一个稚嫩、孤单的乡下孩子牵着他的牛，全身湿透。那一刻，我的脸上有雨水，也有泪水。

翟斌，南京鼓楼医院集团安庆市石化医院医生。